

消费时代主体性困境的生成与超越

——鲍德里亚与马尔库塞批判理论整合研究

李佳毅,郝智慧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064)

[摘要]在消费社会,意义的流失并非只是个人感受,它来自符号秩序的外部编织与主体内部驯化的共同作用。鲍德里亚让我们看清这套秩序,即符号拜物教通过不断制造拟像和编码差异,让物品脱离实际用途,世界失去真实感,人难以再触碰现实。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求完成了对人的内在审视,他提出技术理性与消费逻辑彼此配合,将人的批判意识消解为对受控满足的追逐,人渐渐变成不再反思的单向度的人。外部的符号操控与内部的需求迎合相互强化形成一个闭环,使人失去真实的生活凭依,意义便持续流失。要走出这一困局需要两股力量并进:一是鲍德里亚式的符号反抗,打破符号的强制意义以恢复非功利性的真实交往从而瓦解拟像秩序;二是马尔库塞式的爱欲解放,通过“大拒绝”和新的感知方式重建人的真实需求。只有同时重审外部的符号统治、内在的主体性,才能重新找回真实生活的分量。

[关键词]符号操控;虚假需求;单向度主体;符号反抗

[作者简介]李佳毅(2002—),女,河南新乡人,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郝智慧(1999—),女,安徽六安人,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哲学。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203022>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中图分类号] B089.1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在当代社会,价值坐标的瓦解已弥散为日常中挥之不去的无意义感。物质丰裕,信息触手可及,但意义却反而稀薄了。这种悖论不来自匮乏而出自符号的过剩,它很少激起拒绝,更多地让人沉入一种压抑性满足,不知不觉间消磨掉质疑现实的能力。这正是消费时代主体性困境的典型面貌。鲍德里亚与马尔库塞提供了两条相呼应的反思路径。鲍德里亚指出,符号、拟像与超真实构成新的支配形式,符号秩序的扩张让物品脱离实际用途,世界被拟像包裹,人与真实的联系日渐稀薄;马尔库塞则看到,技术理性与消费体系协同制造虚假需求,把批判意识驯化为对既有秩序的适应,塑造出丧失否定向度的单向度的人。本文认为两人的批判构成互补框架。鲍德里亚的符号拜物教揭示了外部结构,一套靠编码差异和拟像运转的符号秩序切断了人与真实的关联。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理论则剖析了内部机制,主体在秩序中被诱导和安抚,将受控满足当成幸福,完成从外部围困到内心驯化的闭环。符号操控与需求迎合相互强化,意义便一再流失。走出困境不能靠单向挣脱。两条路径需要

并进:一是符号反抗,打破强制性编码以恢复非功利性的真实交往,瓦解拟像对经验的控制;二是爱欲解放,借助大拒绝与感知方式的更新,让自主的真实需求重新生长出来。只有同时解构外部的符号统治并重塑内在的主体性才能重新找回生活的分量。

一、符号秩序与意义的流失

消费社会的运转,并不单纯依赖经济层面的扩张,更借助一套符号秩序的建立,悄然改变了人与物、人与世界的关系。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物的使用价值被符号价值所置换。物不再主要因为有用而被需要,而是因为它在差异体系中所标示的位置而被追逐。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支配形式即符号拜物教,它不像传统权力那样直接施加控制而是通过编码差异、制造意义幻象,把人纳入一个自我循环的符号秩序之中。

(一)符号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替换

马克思揭示的商品拜物教,讲的是商品形式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掩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到了消费社会,鲍德里亚认为拜物教进一步升级:人们不再只是崇拜商品中凝结的劳动,而是更迷恋商品作为符号所携带的差异和身份标记。在这个阶段,物的物质属性和实际功能被不断掏空,日益变成一个漂浮的能指。一辆汽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它作为交通工具的可靠性或便捷性,而在于品牌、车型、配色所传递的社会位置和审美取向。消费行为因此从占有物品,滑向占有符号,这种符号拜物教比商品拜物教更深入一层:它不仅遮蔽了生产关系,也遮蔽了真实的需求和真实的世界,把一切事物都卷进一场没有终点的符号差异游戏。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把这种状态概括为“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意指消费早已不是对物品的单纯使用,而是一整套组织化的意义生产与分配过程。

(二)拟像秩序与真实的退场

符号秩序的稳固依靠一套不断运转的拟像生产机制。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中描述了拟像的演变阶段,当代消费社会正处在“拟像先行于真实”的位置。在这里符号不再需要以现实为参照,反而反过来规定什么被看作真实。广告是拟像生产最典型的场所。它的功能不是提供商品信息而是将商品与某种被简化、被美化的生活愿景强行缝合在一起。钻石广告不是在说明一块碳结晶的物理特性,而是在兜售关于“永恒爱情”的视觉脚本。消费者得到的往往不是物品本身,而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并且永远不完全兑现的符号承诺。当日常生活与广告画面之间出现落差时,消费社会给出的回应不是反思现实,而是鼓励人们购买更多商品来弥合这种距离。持续的拟像生产最终让“超真实”成为常态。

(三)差异的编码与个性的消解

消费秩序最有效的一步,是把“个性”和“自由选择”转化为系统的驱动力。时尚、品牌、亚文化不断制造表面上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是被生产出来的,是“可以相互取代的碎片”。它们在一个封闭的符号体系里轮番登场,最终只服务于持续刺激消费。个体试图通过特别的着装、小众的趣味、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来确立自己,但这种“个性化”的冲动早已被系统预见并收编。看起来叛逆的姿态很快会成为新的消费标签,人们误以为自己在自由选择,实则是在系统给定的选项菜单里做决定。当一切反抗都能被转化为消费,一切独特性都被标准化为符号时,个体便很难再凭借自身来定义自我,其存在感越来越依赖在符号等级中所占据的位置。至此,一个自我循环、自我指涉的符号秩序大致成形。它通过符号价值替换使用价值、通过拟像覆盖真实、通过编码差异消解真正的个性,把人的生活

包裹在一个由意义幻象构成的环境里。鲍德里亚所描述的这种符号秩序,为主体性的深层失落提供了结构性的前提。它不是直接强迫,而是以提供选择、承诺满足的方式,让人在看似自主的活动中逐渐丧失与真实世界的联系。

二、主体驯化:从虚假需求到单向度闭环的心理机制

鲍德里亚描绘了消费社会的外部结构,马尔库塞则转向内部分析个体如何在这一结构中被逐步驯化,完成主体性失落的最后一环。其核心机制正是“虚假需求”的制造与满足。它让主体在看似自主的选择中一步步丧失超越既定秩序的能力,最终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一)虚假需求的植入:技术理性与消费逻辑的合谋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这样定义“虚假需求”：“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在鲍德里亚揭示的符号秩序中,这种需求找到了最有效的表达形式与传播渠道,即符号不再指向物的实际用途,而是不断制造差异、激发欲望,将虚假需求编码为看似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这种合谋有其清晰的运作逻辑。技术理性提供物质基础与合法性外壳,自动化生产与高效物流加速了商品的更替节奏,使符号差异得以持续翻新;效率、计算与控制的原则渗透进日常生活,把人的思维方式也纳入技术化的轨道。与此同步,消费体系通过广告将商品包装为可量化、可比较的“概念商品”,手机的像素、跑车的百公里加速时间,这些数据成了人们衡量生活的尺度。个体在“点赞—消费—焦虑”的循环中将广告塑造的符号标准内化为自我评价的依据,批判性思考被降维为商品功能对比的操作理性。人不再追问“我究竟需要什么”,而更习惯于计算“我能得到什么规格的东西”。

虚假需求从来不是赤裸裸地强加于人,它以提供选择、尊重个性的姿态出现,让满足需求的过程充满“自主决定”的幻觉。

(二)否定性向度的丧失:从批判理性到操作理性

虚假需求的持续制造与满足消耗掉人最可贵的内心能力,对此马尔库塞称之为“否定性向度”。他在《单向度的人》中写道,发达工业社会最令人不安的成就,在于“窒息了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同时“压制了反对现状的思想能够深植于其中的内心向度”。否定性思维,即“对现存东西的超越性思想”,让人能够与现实保持审视的距离,并“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这正是哲学与一切

批判精神得以扎根的地方。消费社会却系统性地消解了这种超越性。当个体沉浸在符号差异的追逐中,当需求被反复制造又被反复满足,审视现实的空间便不断萎缩。社会系统把潜在的反抗能量都导向消费领域:对工作的不满,可以用“说走就走的旅行”来缓释;对不公的愤怒,可以通过购买“公益联名款”获得道德上的暂时慰藉。深刻的社会矛盾与内在焦虑被转化为看似可以通过消费加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思想的目的不再是追问真相与寻求解放,而是变成如何更好地适应系统、更高效地参与消费。批判理性由此滑向操作理性,变成了维护既有秩序的工具。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个强迫的过程,它更像温水煮蛙,在持续获得的满足中,人们自愿让渡了怀疑与否定的能力。

(三) 压抑性满足的悖论:意义流失的最终形态

至此,一条完整的闭环浮现出来:鲍德里亚所揭示的符号秩序提供了无处不在的诱惑与幻象,马尔库塞所剖析的虚假需求机制则让主体心甘情愿地走进其中,并亲手关上牢门。符号的外部操控,经由虚假需求的内在化,转化为主体的自我驱动。人们不是被动地接受统治,而是主动参与了对自身的异化。这正是“压抑性满足”的悖论:在满足中滑入更深的压抑,成为消费时代精神困境的核心症候。它表现为一种深刻的“无根化生存”:当人既无法回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通过劳动创造自身价值的主体性(因为劳动本身也已被符号化、被异化),又难以挣脱鲍德里亚所揭示的符号体系的结构桎梏时,个体的存在便陷入漂浮状态。精神在物质丰裕的荒漠中,找不到任何可以抓牢的价值锚点,意义一再流失,最终形成一种温和而麻木的困顿。它不呐喊,不反抗,只是在无尽的符号追逐中,悄无声息地耗尽人的生命能量。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早已点明:“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而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马尔库塞则在《爱欲与文明》中进一步指出:“在操作原则的统治下,人的身心都成了异化劳动的工具。”这两条判断在此合流:外部操控与内部驯化互相支撑,把对符号的追逐塑造成生活的默认模式,也让对真实的渴望被一再推迟与消解。

三、走出困境的双重路径

符号秩序的围困与主体性的内在萎缩构成了同一个难题的两面。因此,走出这一困境的努力也必须是双向的:既要解构外部的符号统治,又要从内部重新激活人的真实需求与感受能力。

(一) 符号编码的自觉与抵抗

鲍德里亚的后期思想尽管充满悲观的色调,但并未完全关闭反抗的窗口。关键在于,不能指望通

过简单地回到“使用价值”来摆脱符号逻辑,因为使用价值本身早已被纳入符号体系之中。真正有效的抵抗,首先是一种对编码规则的清醒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拒绝将自己完全交由符号来定义。这种抵抗可以落实为日常生活中的自觉选择。减少对符号差异的过度追逐,主动削减那些并非出于真实需要,而更多服务于身份标识的消费,便是在给符号编码制造断裂。参与非商品化的共同活动,比如社区互助、公共空间的营造、不以变现为目的的技艺练习,则是在交换逻辑之外,重新体验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直接联结。更深一层,鲍德里亚早期讨论过的“象征交换”提供了另一条思路。象征交换遵循的不是积累与线性增长的逻辑,而是可逆的、循环的、带有消耗性的关系,在这些时刻人与世界的关系暂时跳出了功利计算的框架,显示出生命经验中那些无法被简化为符号交换的部分。这并不是要回到某种原始状态,而是在充分意识到符号力量的前提下,刻意保留和创造那些不合乎编码逻辑的行动空间,借此让生存保持某种不可化约的厚度。

(二) 爱欲解放与真实需求的重建

鲍德里亚的路径偏重“解构”,马尔库塞的路径则偏重“重建”。马尔库塞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爱欲解放。在马尔库塞那里,爱欲不是狭义的性,而是生命本能中追求快乐、创造与深度联结的冲动,它与压抑性的文明原则构成持续的张力。爱欲解放的关键在于重新区分哪些需求是发自生命本身的,哪些是被外部机制植入的。当人的能量不再主要消耗在符号占有的焦虑上,才可能转向那些真正使生命得到充实和展开的活动。这包括创造性的劳动,即能让人在其中感受到自身力量的延伸,而非仅仅被当作工具来使用;也包括深度的情感联结,不是社交网络上的浅层互动,而是能够承受时间与冲突的实在交往。与之相应,需要培育一种不同于既有消费感性的感受力。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通过大众文化塑造的感性是经过过滤的,它只能容纳那些被净化、被商业整合过的形式,而难以接纳更具冲击力和颠覆性的生命表达。所谓“新型感性”,正是要恢复人对世界更完整的感受能力,能够察觉被日常秩序遮蔽的矛盾,能够被真实的美打动而不是被包装的幻象俘获。马尔库塞将这种感性层面的拒绝与重建,理解为“大拒绝”在心理领域的展开。

(三) 解构与重建的相互支撑

上述两条路径不能彼此割裂。离开对符号编码的清醒认知和持续抵抗,所谓爱欲解放很容易被重新收编。例如,“灵修”变成昂贵的课程,“有机生

活”变成身份标签。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任何形式的解放都必须建立在真实需求得以满足的基础之上,否则就容易被重新收编到符号体系的循环之中。两者之间是双向支撑的关系。符号层面的自觉为内在需求的重建清除了一部分外部压力;而内在需求的变化,又让抵抗不再只是被动防御而有了更为踏实的落脚点。人开始真切地感受到,某些东西是值得追求的,另一些东西是可以放下的。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醒我们,丰盛不是幸福的承诺,而是一种社会逻辑的产物。马尔库塞则在《爱欲与文明》中揭示了另一种可能:当压抑不再是文明的唯一前提时,人的身心便有可能从异化的工具状态中逐渐恢复。因此,只有同时拆解外部的符号操控、重建内部的需求与感性才有可能阻止意义不断流失。

当然,这并非一劳永逸的出路。消费逻辑的渗透力极强,符号编码会不断制造新的差异,虚假需求也会以更精致的方式卷土重来。因此,走出困境的努力,本身就构成一种需要反复践行的日常实践:在每一个具体的时刻,既保持对符号诱惑的警觉,又主动去创造和守护那些真实而有限的满足。

四、结语

消费时代意义流失的困境根植于符号秩序所

构建的外部结构,也完成于虚假需求对主体的内在驯化。鲍德里亚与马尔库塞的批判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勾勒出这一困局的完整轮廓,将两者的分析整合起来不是为了走向绝望,而是为了看清处境本身所蕴含的松动力量。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怎样的符号所围困,正在追逐哪些并非源于自身的需求,这种清醒本身就是挣脱的起点。它要求的不只是理论上的解构,更是在日常实践中保有一种拒绝的能力,即拒绝将自我全部交由符号来定义,拒绝把受控的满足当成真正的幸福。在持续的解构与重建之间,人才有可能在系统性的困局中,为自己的精神生活重新找到一些坚实的凭据。

参考文献:

- [1] 让·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 夏莹,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46-52.
- [2] 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22-25,48,70-73.
- [3] 让·鲍德里亚. 拟像与仿真[M]. 洪凌,译.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33-38.
- [4]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6,9,10,53-56,59-63.
- [5] 赫伯特·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M]. 黄勇,薛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24-28,32,115-120.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

The Emerge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Dilemma of Subjectivity in the Consumer Era —A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Baudrillard's and Marcuse's Critical Theories

LI Jia-yi, HAO Zhi-hui

(School of Marxism,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loss of meaning in consumer society is not merely a personal experience, it stems from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 external weaving of the symbolic order and the internal domestication of the subject. Baudrillard enables us to see through this order: through the constant production of simulacra and the coding of differences, the symbolic fetishism detaches objects from their practical uses, strips the world of its sense of reality, and renders it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engage with reality. It is precisely within this environment that the “false needs” described by Marcuse have come to dominate the inner lives of individuals. He argued that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the logic of consumption work in concert to dissolve human critical consciousness into a pursuit of controlled gratification, gradually transforming people into one-dimensional beings who no longer engage in reflection. External symbolic manipulation and internal accommodation of needs reinforce one another to form a closed loop, causing people to lose their anchor in real life, and meaning thus continues to erode. To escape this predicament, two forces must advance in tandem: firstly, a Baudrillardian symbolic resistance, which shatters the coercive meanings of signs to restore non-utilitarian, authentic interaction and thereby dismantle the simulacral order; and secondly, a Marcusean liberation of the libidinal, which reconstructs genuine human needs through “the Great Refusal” and new modes of perception. Only by simultaneously re-examining external symbolic domination and internal subjectivity can we rediscover the substance of authentic life.

Key words: symbolic manipulation; false needs; one-dimensional subject; symbolic resistance